

再論人面弓形格銅劍

鄧聰

一 前言

1993年11月間筆者於《文物》發表〈人面弓形格銅劍雜議〉，就近年嶺南以至印支半島地區相繼新認識一種人面弓形格青銅劍之分佈、淵源等問題，略作討論。其後筆者參加香港博物館主辦「嶺南古越族文化研討會」，再就香港石壁人面弓形格銅劍製作、使用痕等問題，草成〈香港石壁人面弓形格銅劍試釋〉，刊於《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按筆者初步認識，人面弓形格銅劍之特徵有八點。

- (一) 莖、身一次鑄成，直接握持使用；
- (二) 莖分封閉中空與扁體實心兩種；
- (三) 劍身呈寬葉形，最大寬位於劍身之中部為特色；
- (四) 莖以凹線陰紋為主，身以平凸線陽紋為主；莖、身兩者陰陽紋對照配合；
- (五) 格兩端上揚，中部微彎曲，近似弓形，稱弓形格；格上有豎或橫之凹線劃紋、聯珠紋；
- (六) 劍身上部有人面紋飾，人面外有三角形凸線圍繞，人面全體以三角形平凸寬體構成，眼、眉、口三者施以凸紋，鼻則以細凸線作鼻梁，兩邊凹線作鼻寬。劍身下部起稜或柱脊；
- (七) Y形寬帶紋飾由羽枝、卷雲、三角形等紋飾組成，劍身上及中部位置之Y形寬帶紋飾別具特色，Y形上交叉部為人面紋飾；

(八) 劍長23-29厘米。

1994年初，筆者幸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沈建華女士惠示中國文物精華展覽第三次之展出目錄，其中收錄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山縣石塘鄉石灘出土「人首紋青銅劍」一件，與筆者所論及人面弓形格銅劍有可印證之處。大約同時，筆者又於1993年9月號《考古》，得悉黃啓善：〈廣西靈山出土青銅短劍〉論文，報導石塘鄉出土人首紋青銅劍之發現¹⁾。上述拙文〈人面弓形格銅劍雜議〉中既未及討論廣西靈山石塘鄉之發現，更且靈山之劍首雙環型制與此種劍之淵源有重大關係，尚待考究，遂有此續篇之作，以就正於方家。

二 廣西石塘鄉弓形格銅劍

石塘鄉石灘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靈山縣。靈山縣(21°51'-22°38'N, 108°44'-109°35'E)總面積3,557平方公里，轄5鎮17鄉。縣境有靈山，唐朝以此山名置縣，故稱靈山縣，經各朝沿革至今。縣內地勢由北向南傾斜，北部以丘陵低山為主。東北部羅陽山海拔569米，為全縣最高點。欽江沿岸為沖積平原，地勢平坦。石塘位於靈山縣東北，靠近欽江源頭。自石塘至羅陽山西側順欽江南流，經靈山縣東南郊，於欽州縣康熙嶺附近注入欽州灣。欽州河全長僅179公里。為廣西南部沿海直接入海第二大河流。因此自石塘出海亦頗便利。

自1974年以來，由靈山縣博物館在該縣三海、石塘、新圩、佛子、平南、沙平、煙墩等地陸續發現一批戰國至秦漢時代陶罐、銅劍、銅鼓等遺物。1983年全縣文物普查間，發現此地區分佈戰國至秦漢墓葬。與本文相關

Tang Chung :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鄧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之青銅短劍，1980年4月於石塘公社石塘大隊羅塘石灘出土。據黃啓善報導此劍型制：「爲首、莖、身一次鑄成。劍首原有兩個如同車輪的並列圓環，現殘留一邊，中穿圓孔，有七根如同車輪的輻條。劍莖前圓後扁，圓形部雙面均飾兩道卷雲紋。有格，劍身基部無脊，飾一人首掛於木柵紋飾，可能是族徽。鏘鋒利。從部無血槽，劍身自中部起逐漸收鋒，中起脊。全長39厘米」。此外，黃啓善、覃芳於《中國文物精華》內就石塘鄉銅劍簡介中，又指出此劍兩面紋飾相同。

據《中國文物精華》收錄石塘鄉銅劍照片及拓本均顯示，劍首並列雙環飾爲完整無缺。以下就石塘鄉銅劍之形制特色，論述如下。

- (一) 莖、身爲一次鑄成。
- (二) 劍莖似爲扁體實心式，尙有待進一步核對實物鑑定。
- (三) 劍身呈寬葉形，最大寬位於劍身之中部爲特色。兩側刃略不對稱。
- (四) 莖以凹線陰紋爲主，身以平凸線陽紋爲主，莖、身兩者陰陽紋對照配合。
- (五) 格部兩端上揚、中部微彎曲，近似弓形，格兩側有段階裝飾。
- (六) 劍身上有人面紋飾，人首兩側陰刻羽枝紋飾，人面全體以平凸寬體構成，眉目鼻口均以陰刻成形。劍身下部起脊柱。
- (七) 人面以下有Y形寬帶紋飾。
- (八) 劍長39厘米。

以上1-7點均與筆者所倡議之人面弓形格銅劍特徵吻合。因此，石塘鄉銅劍當與人面弓形格銅劍同一劍種，殆無疑問(圖一：2)。惟石塘鄉劍型制稍大，爲迄今所知此劍種中最長者。又石塘鄉劍兩面紋飾相同。據筆者所

觀察，香港石壁及廣東蘇元山兩處人面弓形格銅劍，劍身兩面均有近似之紋飾。然而，筆者對石塘鄉人面弓形格劍最感興趣者，爲該劍首之雙環飾，由重圈構成，大環套小環，環中間透過由七根軸狀小枝連接。

石塘鄉人面弓形格銅劍之雙環首飾亦非僅見。1965年農民於廣州郊區暹園蘇元山發現一柄人面弓形格青銅劍。^①1993年春筆者幸蒙麥英豪教授惠示蘇元山人面青銅劍實物。此劍劍莖爲扁平，前寬後窄，斷面扁圓形。莖上鑄出較粗線紋圖案。而最引人注目，當然爲劍首雙環飾，大環與小環間下陷分隔(圖一：1)。

有關人面弓形格銅劍之淵源問題，筆者過去曾論述此種劍制與雲南山字格劍及一字格劍、越南東山文化之卷格劍等同屬一大系統(圖二)。從更大範圍比較，更歸屬於北方劍系之鄂爾多斯及卡拉索克劍系。上述論點語焉不詳，特別是人面弓形格銅劍與鄂爾多斯青銅器關係探討，尙有待進一步論證。

三 人面弓形格銅劍淵源

人面弓形格銅劍淵源相關之一爲鄂爾多斯青銅文化。1984年春筆者訪問內蒙古博物館期間，幸蒙田廣金教授惠示近年發掘出土鄂爾多斯青銅器，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關國內鄂爾多斯青銅器的研究，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最重要代表。據田廣金、郭素新研究，鄂爾多斯青銅短劍可分八種。其中與本文相關爲C式、D式、E式三種。C式劍首呈雙鳥頭回首狀，即所謂「變形觸角式」短劍。DI式：首爲「觸角式」的變種，上飾鏤空動物紋圖案。圖案爲兩對對臥的鹿。劍身稍寬，柱狀脊(圖三：2)。DII式：爲「觸角式」短劍的發展形式，劍首爲雙鳥頭相背聯結，已變成一字形(圖三：3)。劍身除柱狀脊外，尙有劍身剖面爲菱形。DIII式：爲「觸角式」首向雙環首之過渡型。劍首似雙環形。劍身有柱狀窩及剖面呈菱形(圖三：4)。E式爲環首短劍。劍柄較窄，翼狀格，格有雙動物頭紋，其餘劍格較平直。劍身均窄長(圖三：5)。

C、D、E式年代分別C式為西周、D式為戰國早期或更早、E式戰國中期。C式短劍有一個從寫實漸向圖案化發展過程。D式「變形觸角式」短劍出自C式觸角式。E式短劍，無論是環狀首還是翼狀格，均是D式短劍的發展型式。⁶³

如果以上C、D、E式變化規律無誤，這對於鄂爾多斯青銅文化影響所及地域青銅文化分期研究，無疑是有重要指標之作用。據田廣金研究，鄂爾多斯式青銅短劍或銅刀器物分佈相當廣泛，除集中於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高原外，在呼和浩特以及內蒙古、山西、陝西之交界地帶，如山西保德、石樓、柳林、陝西米脂、綏德、神木、榆林府谷、河北北部之青龍抄道溝、懷來北辛堡、平泉東南溝、北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延慶西撥子也曾發現。向西南，在寧夏固原、甘肅靈台亦有發現。再往西南，永勝出土的柄首作雙圓餅狀短劍，與鄂爾多斯式短劍相似。熟諳西南中國劍制學者童恩正亦指出：永勝所出C II劍，莖端作雙圓餅狀。此劍式，不見於中原地區，在西南其它地區亦未發現，但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區所謂「鄂爾多斯」式銅劍中則有與之相似者。⁶⁴至於鄂爾多斯式青銅劍與西南地區的青銅劍關係，田廣金、郭素新則認為兩者「截然不同」。⁶⁵

以上對比鄂爾多斯青銅劍與中國西南的青銅器文化，顯然雲南地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域。根據雲南省考古學者張增祺於1993年發表〈絢麗多彩的滇、昆明青銅文化〉中之論述，滇、昆明青銅文化中許多器物與古代北方草原文化器物相同或相似。雲南德欽納古、永勝金官龍潭、劍川沙溪、陸良皮橋等地，均發現有雙環首青銅短劍。⁶⁶雲南地區出土雙環首青銅短劍與鄂爾多斯青銅劍可能有一定關係。

與兩廣北部毗鄰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五省迄今所發現青銅劍群對比，毫無疑問兩廣出土雙環首人面弓形格銅劍與雲南地區之關係較為密切。雲南繁鳳山、永勝與廣西石塘鄉出土青銅劍之雙環首份外相

似。兩廣人面弓形格銅劍中之雙環首因素來源自雲南一帶，可能為較合理之解釋(圖四)。至於雲南與鄂爾多斯間青銅文化相互關係相當複雜，學界未有定論。⁶⁷

四 餘論

(一) 迄今已知出土與人面弓形格銅劍相關資料有香港石壁、廣東蘇元山、廣西木羅村、石塘鄉、越南清化等幾處(圖五)。其中石塘鄉與蘇元山兩者出土人面弓形格銅劍莖均上窄下寬，莖首為雙環式。估計石塘鄉與蘇元山兩者銅劍關係較密切。

(二) 人面弓形格青銅劍可再細分為三式：

I式：木羅村銅劍為代表，弓形格並不發達。

II式：石塘鄉、蘇元山為代表，弓形格發達，劍莖首為雙環。

III式：石壁、清化為代表，弓形格發達，劍莖首未見有雙環。

按筆者〈人面弓形格銅劍雜議〉中分析，三者早晚關係順序為I→II→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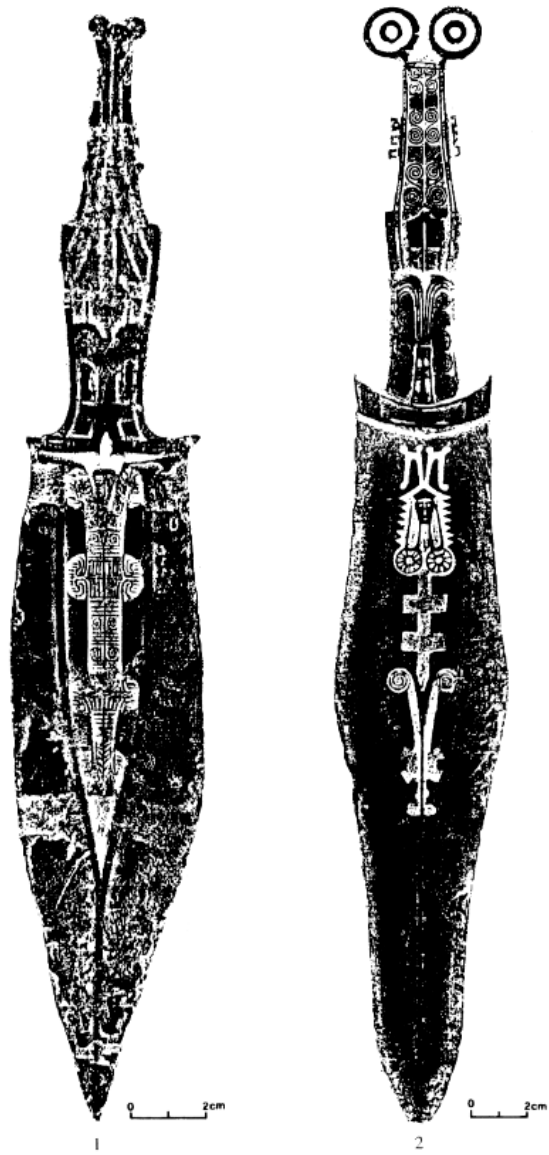
(三) 某些學者解釋人面弓形格銅劍上人首與獵頭活動相關。筆者曾指出劍上人面設計造型和型態都為不變因素。這暗示了人面紋飾可能代表一些不輕易改變之精神信念。由於這些人面的四周都裝飾有羽枝狀的紋飾，東山、蘇元山、石塘鄉三者在此方面最明顯。無疑代表一種向四方發散光芒或者是「氣」的表現。當中人面紋圖案，更可能就是林巴奈夫氏所指「人面形鬼神」的象徵。⁶⁸事實上先秦時期人首並不僅見於青銅器。李學勤教授在討論古玉上人首形象曾精確指出玉器上人首，恐怕都不能以為是斬獲的人頭，而是含有某種神性，有著崇拜的意義。⁶⁹筆者推測古玉與青銅劍上人首在性格上有相同之處。

(四) 誠如李學勤教授指出，部份學者認為考古的收穫僅僅代表歷史上物質文化，是失之片面的。被稱為鋤頭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所得，固然都是物質的東西，可是這些物質的東西又是與古代的精神文化分不開的，寄托著古人的思想和觀念，通過這些物質的東西，可以看到當時的時代精神。⁽¹⁾現代考古學家正努力從物質向精神世界方向過渡。⁽²⁾人面弓形格銅劍是代表兩廣地區一帶象徵某種精神意義之青銅武器。石塘鄉地近廣西西南，從靈山一帶出飲洲灣指日可達。石塘鄉之發現，為解釋兩廣地區與越南清化人面弓形銅劍關係，提供了更直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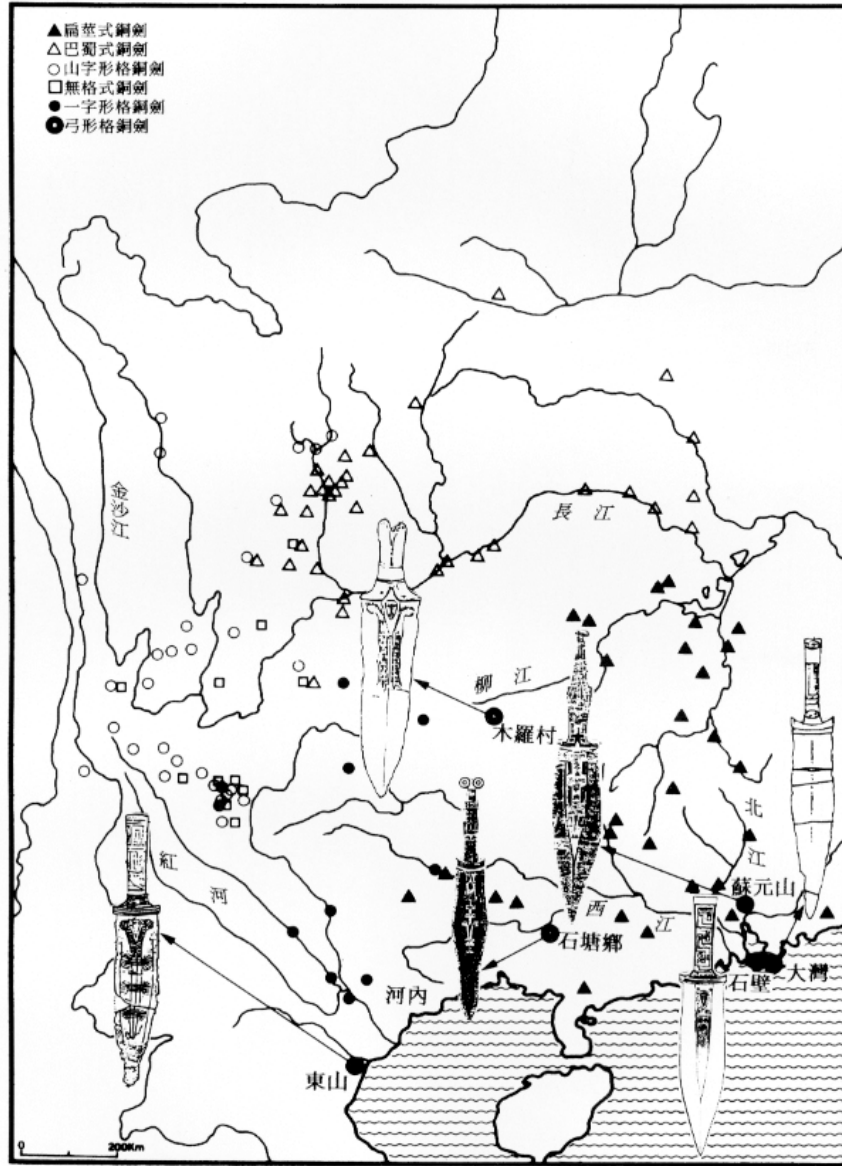
本文匆匆草就，幸蒙香港大學劉唯邁博士、楊春榮先生、古物古蹟辦事處葉祖康先生、招紹環先生盛情敦促。麥英豪教授賜教蘇元山銅劍實物及惠予拓本，並允予發表，先生之學恩不敢忘。黃韻璋小姐製作圖版。一併謹致衷心感謝。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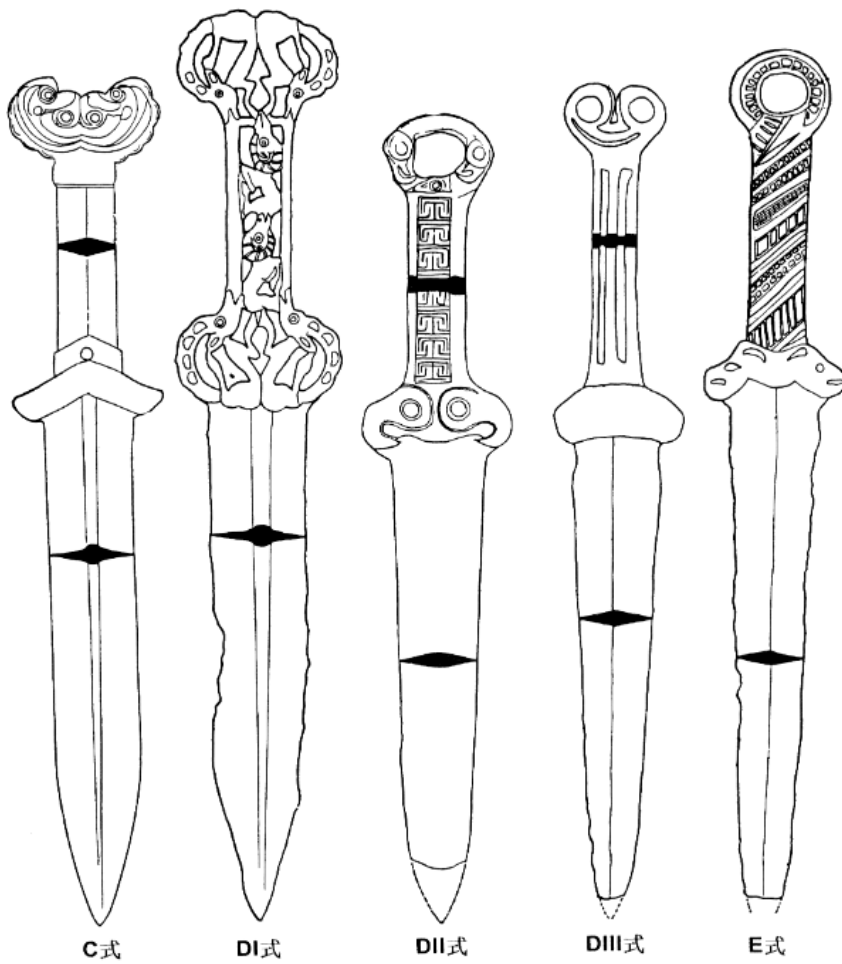
- (1) 黃啓善：〈廣西靈山出土青銅短劍〉，《考古》，1993年第9期，頁860。
- (2) 廣州市文物管理處：〈廣州郊區滘崗古遺址調查〉，《文物資料叢刊》，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頁172-176、188。
黎金：〈古文化遺存〉，《廣州市文物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年，頁47-49。
- (3) 田廣金、郭素新（編著）：《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頁3-40。
- (4) 童恩正：〈我國西南地區青銅劍的研究〉，《考古學報》，2期，1977年，頁35-56。
- (5) 同(3)。
- (6) 張增祺：〈絢麗多彩的滇、昆明青銅文化〉，《中國青銅器全集一滇、昆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頁1-39。
- (7) 今村啓爾：〈滇西の劍〉，《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研究紀要》，第3號，1984年，頁59-98。
王大道：〈雲南青銅文化與新石器文化的關係〉，《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69-280。
- (8) 林巳拉夫：〈國古代の遺物に表はされに「氣」の圖像的表現〉，《東方學報》，第61集，1989年，頁1-93。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樣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二》，1986年，頁161-168。
- (9) 李學勤：《李學勤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67-73。
- (10) 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371-383。
- (11) 安齋正人：《理論考古學—モノからコトへ》，日本：柏書房，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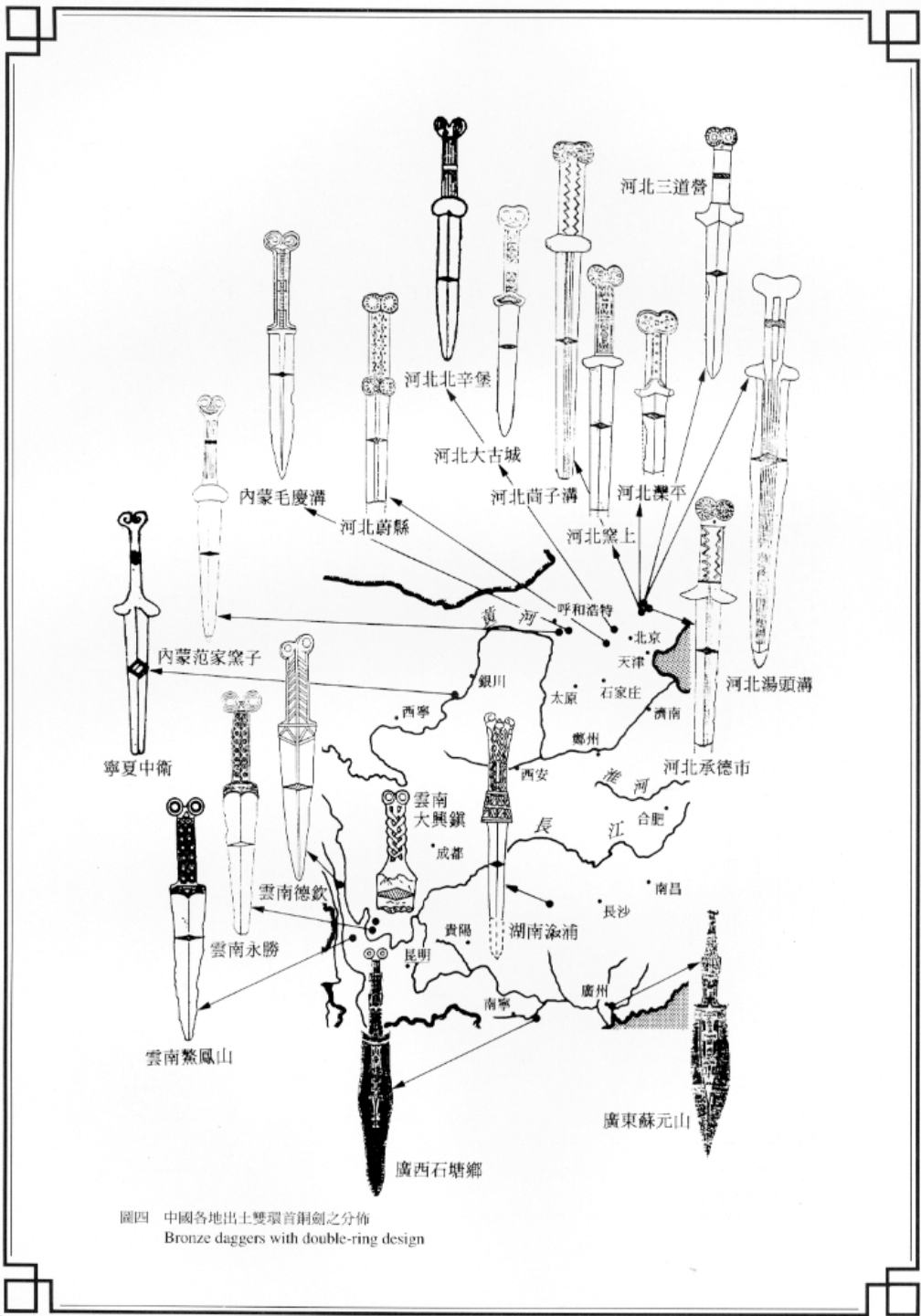
圖一 雙環首人面弓形格銅劍拓本 1. 廣東蘇元山 2. 廣西石塘鄉
 1. Bronze dagger found in Guangdong
 2. Bronze dagger found in Guangxi



圖二 南中國及印古半島青銅劍分佈圖(依西江清高, 1987, 增訂)
 Distribution of bronze daggers in South China and Indo-China



圖三 鄂爾多斯觶角式、變形觶角式及環首式青銅劍(依田廣金、郭素新, 1986)
Bronze daggers found in the Ordos Region



圖四 中國各地出土雙環首銅劍之分佈
 Bronze daggers with double-ring design

遺址	石壁	東山	蘇元山	木羅村	石塘鄉	
莖	長	8.1	8.6	13.8	6.2	12.7
	寬	2.6	2.8	2.6	2.6	4.1
	厚	1.6	1.6	?	?	?
	紋飾組成					
	形制	橢圓空心	橢圓	橢圓空心	扁空	扁空
格	高	1.2	0.9	0.6	?	2
	寬	5.1	5.2	6.5 (殘)	5.1	4.8
	厚	1.1	0.5	?	?	?
	紋飾組成					
	形制					
身	長	18.3	17.4	17.2	16.6	24.3
	寬	4.9	4.6	5.0	4.8	6.2
	厚	0.5	?	?	?	?
	形制					
	人面高	A面: 1.3 B面: 1.5	1.0	1.1	1.6	1.2
	人面寬	A面: 0.3 殘 B面: 0.8	0.7	0.6	1.0	0.8
	人面形制					
	其他紋飾					
	全長	27.6	27.7	29.4	23.2	39

圖五 人面弓形格銅劍劍系的比較
Various styles of bronze daggers with bow-shaped guard and human mask design

Further Discussion on Bronze Daggers with Bow-shaped Guard and Human Mask Design

Tang Chung

[Abstract]

So far, the discovery of bronze daggers with bow-shaped guard and human mask design is still limited to a few localities in South China and Indo-China. These sites are known to be Shek Pik in Hong Kong, Suyuanshan in Guangdong, Muluocun and Shitangxiang in Guangxi, and Dong-son in Vietnam. Since both the Suyuanshan and Shitangxiang examples are having a handle with a broader lower section and a finial with double-ring desig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there is a more intimate link between the two.

Stylistically, these bronze dagg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1) an underdeveloped bow-shaped guard, as represented by the Muluocun example; (2) a well-developed bow-shaped guard and double-ring design on the finial, as represented by the Suyuanshan and Shitangxiang examples; (3) the bow-shaped guard is also well-developed but the finial carries no double-ring design, as represented by the Shek Pik and Dong-son examples. The same order is applicable to their dates.

While some scholars have associated the human mask motifs with prehistoric head-hunting activities, the writer has a different opinion. Their possible role as

the symbol of an ancient cult is suggested by the homogeneity of the masks and further confirmed by the feather-like depictions radiating from around them. The radiation certainly represents brilliant rays of light or some kind of supernatural power.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masks are humanised images of ancient divinities. Similarly, the human mask designs on some Pre-Qin jades are endowed with religious elements.

We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archaeological finds are not simply evidence of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ancient people, but are also honest reflections of their spiritual dimensions. However, there are scholars who still doub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latter. Modern archaeology has evolve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reconstructing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ancient peopl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ir material culture. The bronze daggers with bow-shaped guard and human mask design represent a kind of faith being visualised on the weapons of the southern regions of China. The proximity of Shitangxiang in southwestern Guangxi to Vietnam can possibly explain the discovery of a similar example from the latter.